

洙泗

梁漱溟
与孔学重光



山东省泰山学者
专项经费资助

宋立林

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洙泗：梁漱溟与孔学重光 / 宋立林主编.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1.11

ISBN 978-7-5701-1889-2

I. ①洙… II. ①宋… III. ①梁漱溟 (1893 ~ 1988)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①K8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 227789 号

ZHUSI

——LIANGSHUMING YU KONGXUE CHONGGUANG

洙泗

——梁漱溟与孔学重光

宋立林/主编

主管单位：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山东教育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2066 号 4 区 1 号 邮编：250003

电话：(0531) 82092660 网址：www.sjs.com.cn

印 刷：济南万方盛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2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2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23.5

字 数：320 千

定 价：59.8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1-88985701

《洙泗》同人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杨朝明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孔祥军 孔新峰 孙海燕 刘 伟

刘光胜 刘百淞 陈乔见 杨少涵

林桂榛 房 伟 曹景年 董卫国

主 编：宋立林

副 主 编：魏衍华 陈 岳 刘 昭

编辑部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智文 王 蒙 王 晶 王颂歌

邓俊雨 史亚洁 吕 双 李文文

李蓉欣 刘 璐 邵 辉 张姮宇

罗 晨 赵秋月 郭 凯 郭力佳

袁 祎 陶 杰 焦树艳 韩 笑

褚 燕 颜景琦

作者简介

梁培宽：梁漱溟先生长子。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

梁钦元：中国孔子基金会梁漱溟研究中心主任。

林存光：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宋立林：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教授。

魏衍华：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孙海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黄敦兵：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

刘 伟：安徽工程大学讲师。

干春松：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张亚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郑治文：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刘 奇：淮阴工学院讲师。

褚宏达：江苏苏州田家炳初中历史教师。

夏 芬：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珺娴：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龚 兵：江西农业大学讲师。

程 旺：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陈寒鸣：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

孔新峰：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郭 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俊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学海：浙江海宁王国维研究会会长。

陆信礼：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林桂榛：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暨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教授。

夹纪坤：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孔府管理处文博馆员。

卷首语

唐代刘禹锡于《陋室铭》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曲阜，小城也，然因孔子而名；尼山，小邱也，亦因夫子而圣。洙泗二水，非可与大江大河侔也，然因乎夫子设教而永享盛名。昔曾子语子夏：“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礼记·檀弓上》）兹后，洙泗寢假而为夫子统绪之代称，为中华文脉之象征也。遥想当年，夫子于此，杏坛弦歌，弟子三千，颜曾之徒，优入圣域；讲明六艺，人文化成，删述六经，垂宪后世；瞻望岱宗，鲁道荡荡；伏思周公，礼乐隆隆。

今日神州，古今之变，中西之通，犹未已也。百余年来，志士仁人，殚精竭虑，梦寐以求者，国族之复兴也。历经独立、富强，尚有待乎文明。而今科技虽兴，物质固丰，然尚待人文之化，精神之灵，相辅以相成也。孔孟之道、儒家思想之在今日，当何所为？正吾辈所当深思熟虑者也。今兹欲与诸同人，追本溯源，诠释六经之教，张皇孔孟之道，以固本培元；辨析剖判，研明古今异同，深探中西精微，以面向未来。此《洙泗》之所由设也。

《洙泗》持儒家立场，秉儒家理念，努力成为有情怀、有个性之学术书。本书阐扬儒学之价值，推动文明之开新，实本诸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依傍，尚包容，以开放理性之态度，倡导切磋交流，辩难争鸣，以述以作，不骄不躁，以汇聚青年俊彦，把脉时代思想，赓续洙泗遗风，再现人文胜境。

目

录

CONTENTS

- 1 梁培宽 在洙泗论坛上的致辞
- 3 郭齐勇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
- 23 梁钦元 君子务本，返本开新
- 26 林存光 儒教文教说
- 56 宋立林 儒家教化传统及其当代使命
- 75 魏衍华 梁漱溟论“周孔之教”与中国文化
- 91 孙海燕 梁漱溟中国文化“早熟论”刍议
- 109 黄敦兵 梁漱溟文化哲学的时代特色与现代意义
- 123 刘 伟 作为新文化运动右翼的梁漱溟先生
- 136 干春松 乡村建设和现代政治习惯的建立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探究
- 156 宋立林 梁漱溟乡建理论与儒学基层治理的现代尝试
- 175 张亚军 无私无为
——梁漱溟情理思想浅谈
- 187 刘增光 情感与理性
——梁漱溟与生活儒学的脉络

- 211 郑治文 梁漱溟的“生活”儒学观及其当代启示
- 222 刘 奇 梁漱溟哲学诠释学方法初探
——以直觉主义解孔子“仁”为例
- 233 褚宏达 仁学何以成直觉
——梁漱溟早期的哲学思想
- 243 夏 芬 梁漱溟的情礼观
- 255 王珺娴 从开拓千古真义到宏纳众流
——梁漱溟与唯识学新论
- 271 龚 兵 现量与本体：用唯识学评判西方形而上学
- 282 程 旺 梁漱溟《大学》观略述
- 288 陈寒鸣 中国现代化道路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 297 孔新峰 国家构建视野下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
- 326 郭 凯 浅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
- 333 杨俊峰 梁漱溟与无政府主义
- 345 王学海 重光的可能与文化的新建设
- 353 陆信礼 再谈梁漱溟先生的“返求事实”法
- 356 林桂榛 夹纪坤 梁漱溟与高赞非的交往
- 366 宋立林 后 记

在洙泗论坛上的致辞

梁培宽

我在这里首先恭贺洙泗书院重启和首届洙泗论坛的举办！洙泗书院是儒家的祖庭，在这里举办以“追随梁漱溟——梁漱溟先生与孔学重光”为主题的洙泗论坛，作为梁漱溟后辈的我倍感欣慰！

1917年秋天家父在北大任教。当时只有24岁的他胸怀要为先师孔子讨个说法的抱负。他于1923年在北大开设了关于儒家思想的课程，一直到1924年夏天结束，坚持了一年。

在这之前，他还完成了一个题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长篇连续讲演。时值反孔浪潮高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甚嚣尘上。家父无论是在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提及孔子，还是后来在课上讲到孔子思想，可以说都与这个潮流是不合的。在当时，家父赞成的是“打倒孔家店，救出真孔子”。这是由于当时“打倒孔家店”这个概念很混乱。家父坚信儒家的思想，并致力于还孔子学说和精神以本来面貌。他怀抱着这样的使命，想让儒学回归社会，而不只是在学校的课堂上。

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讲孔子，或是在纸上做文章，而是要践行，要身体力行。孔子的思想需要真正去践行，这样我们讲孔子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口头上讲一讲，那么这样的“践行”是空的。1931年的时候，家父曾到邹平去做乡村建设运动。当时他带着全家人到邹平安家落户。他就是想在邹平通过实际的工作，来对中国的文化做出

应有的贡献。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鲜明的旗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这么多愿意传承儒家文化、参加会议的后生，对此我感到欣慰。他们不仅宣讲儒学，还积极地将儒学践行落地，比如搞乡村儒学、乐和家园。这些都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希望通过本次论坛，让更多的同人达成共识，来完成这项为儒学“正本清源”的事业。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

郭齐勇

1. 问：郭老师，我们都知道您的学术道路起于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未中断。201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可以说是对这一领域的总结之作，而且对于想要系统了解现代新儒学的朋友，是绝佳的入门书。我自己也是新儒家的拥趸，恰好去年入选泰山学者工程。有了经费的支持，我计划5年内发起5次以现代新儒学为主题的学术论坛。2017年5月举办了第一次论坛，主题是“追随梁漱溟——梁漱溟先生与孔学重光”，有40多位学者参加，讨论得很热烈。您当时因事未能参加，我们都感到非常遗憾。所以，我想以笔谈的方式，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梁漱溟先生。那么，还是请老师先从与梁先生的交往开始谈起吧！

答：好的。我们知道，梁漱溟先生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梁先生并不是老古董，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这点很有意思。他的父亲梁济先生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深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旧时大学各科的负责人）陈独秀商量，决定聘请梁先生为北大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那时，梁先生也没有什么学位，蔡先生就能破格让他担任大学的特约讲师。蔡先生非常宽厚，兼容并包，大胆引进不同

风格的人才。梁先生算是民间的学者吧。他写文章介绍学习印度佛学的心得，居然就被聘为北大的特约讲师。当然梁先生并不是一个古板的人，你看他的书，无论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是《中国文化要义》，以及晚年写的《人心与人生》，都显示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不过，他对陈独秀、胡适之他们的一些看法，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挑战。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大的文化比较的框架，比如他的文化三期发展说以及中西印文化比较说，都有充满睿智的思考。梁先生绝不是一个掉书袋的人，他曾经长时间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梁先生是20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时最早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文化人，而且他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我和梁先生的交往，缘于我在研究生阶段对熊十力先生的研究。1984年3月，我作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普通硕士生，为研究熊十力先生哲学思想，搜寻有关资料，曾冒昧地给梁老写信，表示了拜访的意向，并请全国政协办公厅帮我把这封信转交给梁先生。没想到，几天之后就收到梁先生的亲笔回函。他在信中说：“我曾写有《读熊著各书后》一文，又编有《熊著选粹》一册，如承足下来京面谈，自当奉以请教也。”信用毛笔写在两张白笺上，字迹工整，笔力苍劲，很难相信它是出自一位历经坎坷的91岁老人之手。4月1日，我与李明华同志在木樨地一幢大楼的九层上，首次探访了梁先生。居住在这里的大约都是落实政策的对象，梁老的芳邻就是丁玲夫妇。我去梁先生家的时候，在电梯上见过丁玲，还在附近见过陈永贵，他们都住在那里。那是刚刚落实政策的一批人，他们就住在木樨地矗立的几栋大楼里。梁老虽然个子不高、清瘦，但很有精神。梁先生祖籍桂林，却生长在北京，一口京腔，说话一板一眼、铿锵有力。先生记忆力很好，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的风貌以及陈独秀、胡适之、熊十力的轶事，先生都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跟他谈学问谈了很久。我一直是用手在记——可惜那时候没有摄像机、录音机用来记录。梁先生多年没有跟

人谈心了。我这个从武汉来的青年人跟他聊天，他很高兴。但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跟人谈话的时候，不许旁人打岔。我和同伴一起去或者我个人去拜访他的时候，听他讲了几个小时，时间太长了，想让他休息一下，我就跟他打打岔。这时候他就用眼睛瞪着我，我就不敢再打岔了。

以后我每次赴京，必去梁府拜望。他给我详细讲了早年参加同盟会；与陈独秀、胡适之之辩论东西文化；为李大钊治丧；在河南、山东做乡村建设；赴香港办《光明报》；两度赴延安；筹建民主同盟；调查李公朴、闻一多血案等经历。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很念旧，常常把他和章士钊先生等请到中南海聊天，往往要谈及杨怀中先生。

当时我是一个外地青年学子，与梁老素昧平生，却得到他六次接谈，亲赐旧著原版《中国文化要义》和新著《人心与人生》，并亲笔为拙著《熊十力及其哲学》题笺，由是可见其为人。1987年重阳节，我随萧蓬父教授出席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庆祝梁先生九五初度和从教七十周年暨学术讨论的国际会议，得以与海内外学者谈论梁学。不想那次在香山饭店与梁老的相会，竟成诀别。

2. 问：老师有机缘受到梁先生若干次的接谈，真是幸事。像我们这般后生，就只能通过读梁先生的文字来感受其人格和思想的魅力了，但终究还是隔了一层。您觉得梁先生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人格魅力？

答：梁先生说，他首先是一个行动的人。他是实践型的哲学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哲学家，一位在实践中追求智慧，而非在书斋中苦思冥想的人。金岳霖先生在区分中西哲学家时曾经说过，在现代西方，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再也不会有了。分工、技术训练使得哲学家超脱了自己的哲学——“他推理、论证，但是并不传道”，成了职业的逻辑家、认识论者、形而上学家。这可能对哲学有些好处，“但是对哲学家似乎也有所损伤”，“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因为，哲学成为符合逻辑的理论系统、知识体系，而非内化为人的精神生命，以及指导他如

何行为的智慧。相反，“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近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这个修养过程显然是不能中断的，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抬头，失掉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永远在行动或者试图行动……他同苏格拉底一样，跟他的哲学不讲办公时间。他也不是一个深居简出、端坐在生活以外的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①

我想，没有理会金先生这些话的人，不论知道多少哲学知识，建构了多么辉煌的哲学体系，写了多少关于中国哲学的书，都很难说他真懂得什么叫中国哲学，自然也就无法理解梁先生的思想、著作和人生。就“人格与学问不二”这一点来说，被称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梁先生与熊十力、马一浮先生一样，都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都是人格上的典范。但不同的是，熊、马两位先生从中年起埋首学术，不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梁先生却颇有一点孔子遗风，席不暇暖，四处奔忙。他不习惯过书斋式的生活，1924年辞去北京大学教职（那时已在北大执教7年）。自己创办师生生活在一起的书院式学校，之后在广州、河南，特别是山东邹平，从事了八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他的著作有很大一部分与“乡村建设”有关，如《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论文集》等。正是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梁先生以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名世。在50年代初期的“批梁”运动中，“乡建”是一个十分

^① 金岳霖：《中国哲学》，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重要的靶子。其实，梁先生的乡村建设，作为改造中国旧乡村的一项综合性的改革运动，无论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学、教育学的角度，都需要被重新评价。包括其他从事乡村建设的前辈，如晏阳初先生等，绝不是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中所鄙薄的那样。梁先生的乡建工作，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一次实践，而且也是在文化的风雨飘摇中重塑中国人的心灵、再铸国魂的一次尝试。

他是一位真儒，有自信力，决不趋炎附势。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和现在的《光明日报》没有直接的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到广西，当时情形非常危险，但他心地坦然。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还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我若死了，人家怎么知道孔孟之道呢？”梁先生就是这么有自信、有担当意识的人。一叶扁舟在海上遇到风浪，他相信自己不会死。这很像孔子。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夫子带着众徒路过匡地的时候，匡地的老百姓错把孔子当成了阳货，因为孔子和他长得很像。阳货这个人曾经残害过匡地的老百姓，所以匡人就把孔子和他的徒弟们抓起来囚禁了五天，孔夫子自信不会死。“文不在兹乎？”华夏斯文的传统，就是靠着一代一代的文化人脚踏实地地努力。他们承担着华夏文化的存续和安危。所以张横渠（张载）有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人们说这是儒生的狂妄，其实这不是狂妄，这是儒家的担当！这是儒家的志向！儒者其实就是这样的人，像孔子、梁漱溟这样，天命在我心中，我承担着华夏斯文的传统。

闻一多、李公朴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下遭到暗杀，梁先生代表民盟到

昆明调查闻、李遇害案。他在昆明的广场上发表演说：“我知道在场有国民党的特务，我也知道你们拿着枪。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民主的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回忆参加调查国民党暗杀李闻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梁先生的人格魅力。

1974年“批林批孔”，他参加政协委员会工作人员组织的政治学习。梁先生这个人又“不甘寂寞”了——他又发言了。他说：“人家一定要我发言，我不发言还不行，那我就说。你们可以批林，但是不可以批孔。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世界文化的伟人，怎么可以批孔呢？”（《梁漱溟问答录》）后来大家都围攻他，喊口号：“梁漱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面对这个场面，梁先生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用孔子的话来回击当时的政治氛围。由此可见梁先生这个人的风骨。他弱小的身躯却有着这么强大的精神能量！梁先生于1974年写了《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文章，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他是具有这样一种气概的人物。

作为典型的中国学人，梁先生的生活和他的思想，其人格和学术著作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他的思想化成他的行为，他的行为是实践出来的思想。这一点，是否说明他只是想在20世纪重新复制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那样的人格呢？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这样看。因为，孔、孟无疑属于早期儒家人物，而梁漱溟属于当今的一位儒者。由于时代不同，经历迥异，梁的行为显然不能被看成只是在本能地模仿孔、孟，而是在外来文化带给他强烈痛苦的刺激和思考的基础上，并在若干选项存在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自觉选择（孔、孟比较梁氏而言，更无从选择）。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梁与熊、马诸位的不同。其在思想基础上选择行动，注重实践，使其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自觉不自觉地经常被推到政治的旋涡之中。这就使身心完全投入的梁漱溟既不能做到政客那样无良知，也不能做到学者那

样客观和超然。他常常无法逃避现实的风浪。不过，因为梁漱溟的真诚，也因为他学习中国传统的智慧，特别是儒、佛两家的智慧，却总能够使其在复杂的现实中挺立人格，表现出真实的力量，在迎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

3. 问：我们知道，在现代新儒学中，有“新儒家三圣”之说。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三圣”是怎么出现的，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答：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上面已经讲了第一代学人。第二代学人中还有后来到港台去的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第三代有杜维明先生、成中英先生、刘述先先生等等。因为在文史哲领域有这些前辈在做哲学思考、思想反省，我们将这些思考与反省称为“现代新儒学思潮”。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是第一代学人，三位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

“现代三圣”，即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而“三圣”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也没有考证。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访问过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的许多弟子，包括梁先生本人。梁先生的很多弟子就称这三位老前辈为“三圣”，这大概是口耳相传吧。三位先生的弟子也是相互流动，跟着他们生活在一起。像我们湖北孝感的张立民先生等人，我都没见到，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世了，但他们留下的资料里也是写“三圣”。

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第一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当然有很多了，不过他们三位是挂帅的人物。因为在新文化运动后，主流思想是全盘西化的，像胡适之先生、陈独秀先生、鲁迅先生等等，他们代表着知识界思潮的主流。当然也有黄季刚先生，他骂胡适之先生，骂得很惨。在东方文化派或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或者其中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第一代人物中，最具有哲学思考性的人物，包括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以及张君勱先生（他的西学很好，他也是法制的专

家)，还有钱穆（宾四）先生。第一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分两拨人，除了“三圣”和钱先生、张先生之外，还有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方东美先生等。贺麟先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他在40年代写了很多关于儒学复兴的文章，都非常好，像《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带有宣言性的文章。也就是说，在知识界全盘西化的背景下，有一些很敏感的学者，他们在反思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些学者中，梁先生、熊先生和马先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人格感召力很强，因此被学生视为“圣人”。

4. 问：其实，敝校与“新儒家三圣”也有渊源，比如我们创校校长高赞非先生就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十力语要》中的《尊闻录》便是出自高先生，高先生还是梁先生乡村建设运动的得力干将。另外，马一浮和熊十力先生弟子吴林伯先生也曾在敝校任教过。1956年，曲阜师范学院从济南迁到曲阜伊始，吴先生就受高校长之聘，任中文系讲师，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任学院院务委员，直至1962年返鄂。1986年退休后，他又受聘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我手头有一本《论语发微》，就是他20世纪80年代在曲阜时所作。“三圣”中，梁先生与熊先生交往比较多，两人之间的故事很多。请您给我们讲讲他们之间的交往吧。

答：贵校创校校长高赞非先生很了不起，他们兄弟及父亲曾同在熊门，都是熊先生忠实的学生。高校长有功于熊学。吴林伯先生在敝校任教期间，我曾多次拜访他。吴先生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的评审与答辩专家，是我的恩师。

熊、梁两位前辈的交往，要从1919年说起。那时，熊十力先生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教国文。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写信给当时任北京大学特约讲师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说，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元”字也可以读“玄”，探讨的是佛学），熊先生已经拜读了，其中骂他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与梁先生晤谈。梁先生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的第三部分，对熊先生1913年在《庸言》上发表的《健